责编：曹颖新　E-mail:wenshiban@hotmail.com　Tel:010—62806236　　2014年11月3日

文化视野

人伦日用化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

□熊　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不断演化而汇集成的反映民族特色和风貌的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物质形态和思想观念的总和，也是历史的本质反映。认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及其功用，有利于我们今天探讨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重视入世人文思想。受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视人伦、关注入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等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从中国古代历史意识形态层面来看，人们受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最为深刻，儒家崇尚经世致用的入世哲学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旋律。中国文化提倡“人与天地参”，将人提到与天地对等的地位，从而对人生的体验生发出一种平实与理性，成为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思想传统，强调将个体的努力与家族和国家的发展统一起来。

强调伦理道德教化。受儒家“忠孝”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的思想意识非常深刻。中国古代也历来高度重视教育，主张尊师重教，视教育为民族生存、国家安定的命脉。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伦理纲常的道德教化一直作为调和人际关系的准绳，以其深入人们思想观念的精神支柱作用维系着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

倡导中庸处世哲学。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中庸”“和谐”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中庸”“和谐”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是中华民族永恒的文化信念和价值追求。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中和”，在社会中有着团结、融通、凝聚、协调作用，作为中国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文化信仰和治世理论，它融合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世代流传。

关注顽强文化性格。中国长期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创造出坚韧顽强的传统文化，它不仅推动着民族国家的兴旺繁荣，更成为民族危难之际国人勇于反抗和斗争的强大精神支撑。坚韧顽强的文化性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自强不息的根基，是中国人积极的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也是处理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总原则。这种坚韧顽强的文化性格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一种自觉意识和性格，集中体现了人生在世，要为崇高理想竭尽全力奋斗的正义追求，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功用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于华夏民族所生存与依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中，凝聚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对中华儿女的人格修养、对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等意义重大。

精神塑造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在引导人民正确价值取向、产生强大民族凝聚力、塑造优秀民族品格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

价值导向功能。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伦理纲常道德教化，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助于培养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在人生入世上，传统文化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奉公意识；“天人合一”思想起着团结、融通、凝聚、协调的作用，成为和谐社会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文化致力于将人和自然、人与人以及人类自身诸方面协调统一，达到和谐。这是一种文化整合过程，为中华民族塑造出一种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

民族凝聚作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虽屡受内忧外患的侵扰，但依然能绝处逢生、屹立不倒，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古至今，民族“大一统”思想深深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历代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正是这股民族凝聚力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坚强意识和刚毅性格。

精神激励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塑造了统一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并以强大的凝聚力将中华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塑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蕴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国人民激流勇进、百折不挠。美国社会学者丹尼尔·贝尔说：“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

春节文化仅有表演是不够的

□陶立璠

“春节符号”全球征集活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走进社区、走进学校、走进华人世界。对于影响中国人，又传承了几千年的春节文化，这一活动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春节符号”全球征集活动的目的，是要中国人充分认识它的人文价值，同时使春节文化走出国门，与世界人民分享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但是要回答中华春节文化为什么“走出去”，怎样“走出去”，“走出去”以后会怎样，却是很难的问题。难就难在如何通过“春节符号”征集活动，取得春节文化在全球，或某个地区、某些国家、某些民族对它的认同感。中国人对自己的春节文化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并积极地参与创造并传承了这种文化几千年；全世界的华人对中华春节文化也有同样的认同感，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并将它带到了世界各地。但是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来说，中华春节文化完全是一种陌生的异文化，是很难有认同感的，也就很难接受这种文化，使其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文化离开了它的生长土壤，在别人看来只是一种表演形式而已，对这种表演形式产生好感就已经是最好的回报。

一种文化“走出去”，在异地传播是有许多条件限制的。中国周边有所谓“汉字文化圈”国家，如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这些国家与中国相邻或一衣带水，民俗文化的传播随着长期以来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彼此互相影响、接受和传播，这就是这些国家至今还保留着“春节文化”的原因。可见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内在或外在的原因。历史上造成这种传播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种文化包括像中国的春节文化，首先总是在相邻的地区和国家传播，逐渐扩展开来。历史上东亚各国和中国比邻，文化的交往历史悠久。特别是中国的汉字文化对周边国家影响深远。日本、韩国、朝鲜、越南都曾经用汉字作为书写工具，许多文化现象通过文献记载，通过书面文化的方式，被介绍到国外，得到传播。

文化的传播取决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华春节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和中国毗邻的东亚各国也是农业社会。节日文化是一种时序文化，一年四季随着季节的不同，人们创造了相应的节日文化。时序文化的产生在于历法的确立。中国从汉代起，颁布了今天仍在使用的夏历，一个个节日文化被设定在一个个节点上。东亚各国移植了中国的历法即农历，所以春节都在正月初一。越南、韩国、朝鲜都将春节定为法定节日，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改用公元历，将春节移到元旦，但是过春节的仪式、内容没有变化，只是时间的前移而已。

文化的传播从来都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也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有选择地接受。我们将这种传播方式称之为“采借”传播，即在和平的环境中，通过异文化的自然交流和影响，当一方的文化引起对方的兴趣时，“采借”才能开始。就如我们在花园里采摘花朵，最引起你感兴趣的那一朵你才会采下来，可见采摘是有选择的。所谓文化的“采借”本身就含有选择的意思，也就是对方的文化中，选择对自己最有意义和使用价值的部分，加以改造，然后植入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完成文化的传播过程。战争、灾荒、人群迁徙也可能造成文化的传播，但这种传播是带有强制性的，接受的一方是被动的，而“采借”则是主动地接受。和中国周边汉字文化圈各国的春节文化相比较，虽然时间上都是正月初一，内容都是祈祷农业丰收、祈求阖家平安，但具体的文化内涵是不一样的。比较而言，在这些国家中，越南的春节更像中国的春节，如忙年、扫尘、贴对联、请门神、燃放鞭炮、吃年夜饭、守岁、拜年等，和中国的春节文化如出一辙。而日本、韩国、朝鲜的春节文化则有了许多变异。比如日本春节不贴对联，而是用门松装饰门面，迎接春天的到来。

当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接受、改造、传播以后，就变成它的一部分。民俗是一种靠口头和行为传播的文化，它的传播是不受国界限制的，因此民俗文化的传播是没有国家主权之争的。就如我们不能指责韩国的“端午祭”是侵犯了中国的文化主权。韩国的“端午祭”完全是他们民族接受中国端午文化加以改造，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它和中国的“端午节”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只是在时间上和中国的端午节重合，内容完全是变异了的。春节文化也是一样，不能说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的春节是中国的春节文化。

除了东亚各国春节文化的传播方式之外，还有世界各国华人社会的春节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作为移民文化，最能体现中国特色。在移民国家过春节，最典型的是新加坡。新加坡人管春节叫“华人新年”，届时要吃团圆饭，送红包、拜年，被禁放的烟火爆竹35年后又燃放起来，年俗沿袭广东、福建习俗。此外世界各地凡是华人聚居区，如有些国家的“中华街”，春节文化气氛就很浓。中国移民社会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所以当我们提出中华春节文化“走出去”时，不要忘记那里的移民。他们才是中华春节文化“走出去”的先驱。和中国内地的春节文化相比，世界华人社会的春节文化可能更有特点，比如敬神、祭祖，是中华春节文化的灵魂。华人社会大都虔诚地信奉神灵和祖先。每个移民群体，当其离开故土时，总是将祖先的牌位带在身边；当其发家致富时，不忘记故乡，要返回故土，回报祖国。这就是春节文化造成的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今天我们提倡中华春节文化“走出去”，虽然晚了几百年，还是有意义的。但是“走出去”如果只是组织文艺团体的表演是不够的，要和早已走出去的华人移民团体相融合，壮大他们的力量，尊重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使中华春节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中，才能得到弘扬和发展。

随想录

从“自化”到“自主”

□周　耿

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所谓“自化”，即自我化育，而“自化”的内涵除了“自富”，也即经济富足之外，主要体现为“自正”“自朴”，意即人可以自我端正、自化于朴，人人皆有一种道德自觉，自然倾向于保持、复归于朴实的本性，老子正是把“自化”当作教化的方法与目的，其实质在于充分信任人有一种自我净化的人性倾向与人性能力，而这正是老子教化哲学的本源。

人性：教化的本源

既然教化的对象是人，那么，教化的方法与手段就应当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只有懂得了人性，我们才知道为何要进行道德教化、道德教化如何可能以及怎样可能。老子以“自化”为中心的教化哲学正是建基于他的人性论之上。

老子认为，人性是清静无欲的，是善的。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在老子看来，道是天地万物的总规律与总原则，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的生成是在道的支配下，与某种物质相互配合形成的。在道生成人的过程中，道赋予人以清静无欲的本性。老子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德”即性，德源于道，“道常无为”，道的根本性质是清静无欲的，因此，人的本性自然也是清静无欲的。道不仅赋予人清静无欲的本性，还将保护、蓄养人的本性，而道对人性的蓄养主要通过“德”来体现，所以老子说“德蓄之”。

尽管道对人性有着蓄养作用，但是，道赋人以清静本性的同时，也赋予了人以“心”，即自由意愿。接受道的蓄养，从人的角度来说，也就是意味着按照道办事；但人们往往不按照道办事，脱离了大道，亦即不接受道的蓄养，从而导致人性的异化，教化的必要性由此产生。

究竟说来，人性之所以异化的形上根据在于：“反者，道之动。”在老子看来，一切事物总是在道的支配下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其具体过程体现为：“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大道支配万物运动发展，发展下去就会走向极盛，走向极盛之后又要返回到原处。人性的衍化也是如此：人的天性是美好的，无知无欲，然而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的欲望开始膨胀，人性异化，渐渐远离了自己的原始本性。这一个过程也就是老子所描述的“大曰逝，逝曰远”阶段。因此我们说，人性可能异化的形上根据在于“反者，道之动”。

老子同时认为，被异化了的人性是可以复归的，人性的衍化有一个“远曰反”的阶段，也即教化是可能的，而此一可能的形上根据也在于“反者，道之动”。

从“自化”到“自主”：教化的方法

以上从人性的角度，讨论了教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那么如何进行教化呢？老子主张“自化”，而“自化”作为一种教化方法建基于人性论之上。

人性源自于道，道是天地万物的总规律与总原则，人为万物之一，人性体现为人之为人而不为它物的规定性，亦即人存在的根据。由此，在生活中，人若要维持其作为“人”的存在，就必须通过“自正”（端正自己）“自化”（自我化育）来保持其本性，使自己合乎作为人的规定性。从道之“德”，或者说道赋人之“性”，是“自化”的内在根据。并且，道在赋人以性的同时，也就赋予了人维护、复归其本性的人性能力，使人能够“自化”“自正”。

与此同时，道的本源性意义也为人如何“自化”“自正”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就道之本义而言，主要有三层意义：其一，道路；其二，引导；其三，一位首领与其追随者共同在找寻他们的道路、途径。从道德教化的意义上来说，“道”意味着教化者引导人们遵循社会共同认定道德规范。

以往的道德教化更侧重于给人划定界限、路线，通过引导人们遵循外在的道德规范来达到教化的目的，例如儒家所提倡的“礼门义路”。但是，在道家看来，已经划定的路线或者说道德规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稳固性，而社会环境和人性是复杂多变的，执守已经固化的道德规范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一方面造成了个体的伦理困境，另一方面也将给道带来遮蔽。庄子说：“道隐于小成。”（《齐物论》）“成”就是完成；小成，小的成果，完成的某个阶段。具体的道德规范作为一定时期的社会法则，有其时代性与局限性，而此一“小成”就遮蔽作为通途的大道。道就其本源性而言应当是“在路上”，是一个过程；就人性修养之道而言，“道”体现为一个德性养成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

在此一过程中，人们“自化”“自正”，依据自己的个性，自己划定界限，找寻自己的路。自己划定界限，也即根据周遭环境自己规定自己、自己约束自己，在遵循社会规范的同时，保留并形成自己的个性。就自我划界这一点来说，这与现代社会的权利观念是相通的，从而使德性修养与人的权利结合起来成为可能。又因其是自己规定自己、自己给自己划定界限，从而保护了人的自主性，涵养了社会的活力。

从道德教化的主体来说，人的“自化”“自正”能够实现，还需教化者采取一种“无为”的方式去进行道德教化。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正。”换言之，只有“无为”才能给受教者提供“自化”的基础与环境。

所谓“无为”，即顺物而为、顺性而为，不多为、不妄为。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道的根本性质，人的“无为”是对道的尊重，尊重道对人性的根源性作用与蓄养作用，从而使得“自化”“自正”得以可能。老子说：“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对道的尊重，从具体行为来看，即对人为的主动减损。文子说：“道立而不教。”（《文子·自然》）教化作为一种人为的方式在这里被消解，其实质意义在于尊重人的自主性，肯定人的人性能力。所以文子接着说：“道立而不教者，不夺人能也。”（《文子·自然》）“不夺人能”即是肯定人性有着自我端正、自我化育、自我净化的能力，主张给人性以充分信任与尊重，给受教者一个宽容的空间，尊重受教者的本性与人性能力，注重引导，不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到受教者身上，尊重人性的特殊性、个性，让人们从内在自主性上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德性的养成，以“不教”教之，最后达到“不教”。

文化长廊

文化新论

诗性文化的使命

□刘士林

最近一段时间，和中华诗词在当代的命运关系最密切的话题，无疑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尖锐指出的“去中国化”问题。我个人以为，未必是教材编写者有什么目的，但同时也因此感到更深刻的悲哀和无奈。近代以来，以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坚船利炮”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为先导，以20世纪初期西方“德先生”“赛先生”为代表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为中坚，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后现代文化”为代表的理论与文化思潮为殿军，一种“以西方之标准为标准，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的殖民心态由表及里，由外而内，成为百年痼疾。一些人对像这样的“去中国化”已经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甚至是无意识化了。但最令人惊奇的却是，这个问题很大的“冰山一角”，竟然是从教材中的“古典诗词”被掀开的。这正说明了美轮美奂的中国古典诗词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所特有的内在密切关系。

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即：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区别开，具有所谓的“原创性”。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

经过了20世纪近百年的“西方化”，经历了21世纪以来同样是由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化”之后，很多人都以为“世界大同”了。由此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带来了两大普遍问题：一是不知道中西文化的差异，二是不知道如何表述这种差异。而重建中国诗性文化，不失为一条可以重点考虑和实施的文化战略理念和路径。

首先，中国古典诗歌，既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也集中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根本性差异。

尽管中国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品类繁盛，但精神气质都是诗性的。它肇始于人与自然的交感，但却不同于西方主、客之间相互对立的机械原理。它深入到个体的灵魂深处，但与西方个体深层的“本我”“冲动”“死亡本能”在结构上迥然不同。中国诗性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唐诗与宋词。古人已有“唐诗主情”与“宋诗主理”之论。今天，由于有了西方民族的“理”与“情”，所以这一说法已然十分不准确。对这两种“理”“情”不加区别，特别是以西方之“情”之“理”释中国古典诗词，是把后者搞得“非驴非马”的直接原因。在理性文化中，“情”与“理”不相容，因而，“情”就很容易在反理性冲动中沦为“本能”与“欲望”，“理”也时常要异化为一种与感性生命无关的抽象“范畴”与灰色“模式”。在诗性文化中，由于两者如盐入水，融合无间，所以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而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以诗性智慧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心理，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其根源就在于此。这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所在。

其次，当代中华诗词，既是中国古代诗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承与延续，也负载着一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和尊严。

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渐多，但关键问题仍在于，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与根本的中国文化利益。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容易弄清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但现实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由于倦于思考，由于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存在与需要，同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思考、判断与选择。

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方方面面先进的理念和做法，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强调的是，如果这最后的结果是邯郸学步和文章道弊，那就很有必要反思甚至是加以警觉了。未来世界，决不只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这就是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当代天职与崇高使命。